

茶 座

经济与文化二元结构下的传统节日

本报记者 刘 茜

2013年春节就要到了,而春节后也是中国传统节日比较集中出现的一个时期,像腊八节、小年、元宵节等等,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传统节日,过好传统节日? 记者日前采访了部分民俗研究、非遗保护方面的学者专家,他们认为,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今天,挖掘节日内涵,传承和弘扬传统节日文化,还有很多的事要做。

正视农村、城市居民对传统节日的认知差异

记者: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影响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在经历着从已持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急剧转变。以此为背景,与传统农耕文明关联密切的传统节日正面临比较严重的传承危机——许多节日因为缺少与现代生活的一种转化性介入,正在淡出人们的生活。

李松(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基础主要是农耕文化,我们传统节日脱离不开这个文化土壤,但是我们今天碰到的是城市化,就有一个二元结构的节日文化的纠结。比如说放假,农村没人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一进腊月就忙年了,过完正月十五还得歇几天,而城里边还闹心哪天放假,而且变成一种非常明确的二元结构下的纠结。

张士闪(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城乡差异

的放大,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而这正是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由此前的相对恒态走向剧变的一个时刻,从80年代初至今,城乡差异的深刻化与中国传统节日的当代传承的没落是同步发生、同时进行的。

具体来讲,由于城乡之间在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城乡居民对传统节日的认知也出现差异。农村居民对传统节日活动的认知程度较高,城市居民则相对较低。农民更倾向参与信仰色彩较重的节俗活动,而企业员工更喜欢参加娱乐性、参与性较强的活动。农民喜欢参与比例高的节俗活动有端午喝雄黄酒、七夕乞巧,企业员工则是二月二理发、中秋节和春节送节礼等。因此要借助节日文化这样一个平台,促进城乡的良性互动,增强农村发展的活力,来缩小城乡差距。

应充分尊重传统节日的历史积淀与地域特性

记者:现在几大传统节日都有了法定节假日,有了时间保证。然而我们还是听到有人反映现在年味淡了。他们说,过节不就是一个吃喝节、购物节——春节吃饺子,元宵节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这种声声抱怨却也反映百姓当中浓厚的过好传统节日的情结。传统节日的内涵究竟该如何保持?

祁庆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如果把传统都丢失了,就不再是传统的节日,我认为在传统节日中有两项是它的核心,一个是仪式性,另外还有一个信仰性,这两个应该起主导作用。我们如果把这两个破坏了,就会破坏传统。而现在确实存在这种现象,传统仪式性受到的冲击比较大。目前在弘扬节日文化的过程中有两个误区,我们应该予以警惕,一个误区就叫做狂欢节,一个误区就叫做情人节,几乎所有的传统节日都在往这上头靠近,中国九大节日和狂欢有关的大概只有元宵节,元宵节可以闹,这是传统的。我认为,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挖掘节日的文化内涵,节日是传承中华民族的节日文化和优秀精神的文化空间,这是它的核心。

李松:实际上,我们对传统节日的历史和现状并不十分了解,没有从国家层面作全面整理。我们对传统节日讲不全,包括少数民族的区域节日,宗教节日的民族性等。实际上节日研究中的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这样一个大的话题,对研究现在整个的节日状况有非常大的帮助意义。这方面我们的确展开的工作还不多,深入地研究非常有必要。

一些地方在文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对于少数民族节日重视不够的情形。某些地方政府对于如何选择节日活动、怎样安排节日活动时间和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任意性。同时媒体和商家宣传在定位上有时存在不

准确的问题。少数民族节庆活动一旦与祭祀仪式相关,就会被某些媒体冠以原始信仰、图腾崇拜等说法。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一些旅游企业以类似方式来诠释少数民族节日,将少数民族节日庸俗化,以肤浅时尚的表演方式吸引旅游者。因此,以恰当的方式保护少数民族节日文化资源,才能使之稳定持续发展。

张士闪:传统节日表现出很强的“在地化”特征,不同地域的民众对同一节日的认知、评价、参与和期待是不一样的。如北京市门头沟区板桥、庄户、千军台三村在元宵节期间讲究合家团圆,但春节则不强求。不同地域中不同的整体社会发展状况和节日传统,实施适度增量的弹性放假制度。以此作为目前国家法定假日制度的补充。这对于广泛意义上的保护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探寻传统节日现代化的途径

记者:几千年的中国传统节日能绵延至今,其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的传承发展。如何让传统节日面对新时代的民众需求而生生不已? 为当代社会有机体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李荣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非遗保护专家):现在需要研究很大的问题,一个是人们过

节的理念不同,期盼不同。再一个就是过节的人群有变化。创新不是破旧立新的那个新,也不是除旧迎新的那个新,而是在继承传统节俗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的期盼需求,增加一些新的节日文化元素。比如最近几年市场上热卖的灯笼挂饰、鞭炮挂饰等,便都是将传统吉祥与现代时尚元素巧妙结合的商品。

应有三个方面的创新发展,一是节日活动气氛与空间的营造与创新,二是节日活动内容上的创新,三是节庆文化符号、文化产品的创新,这三个方面的创新是应该有的,还是很有必要的。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社会学发展所所长、教授):我们不仅应该将传统节日看作文化遗产,同时还应该看作文化资产,要让它为今天的生活提供文化产品服务。可以进行物质产品的开发,节日食品、节日用品、节日礼品系列,如果经营得好就会有巨大的商机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已经有企业在进行春节博览会的经营。春节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西方的圣诞节的营销模式可以作为我们春节效仿借鉴的对象。利用节日推动消费市场,又借市场扩大传统节日的文化影响,是传统节日现代化的途径之一。此外,我认为还可以增强传统节日的娱乐功能,以满足年轻人的精神需要,这样当代社会的传统节日才可以真正赢得新的传承人,民族节日生活才能葆有永久的生命力。

淮北花鼓戏要加强保护和扶持

安 葵

录,宿州市埇桥区花鼓戏剧团是这个项目的保护单位,也是这个剧种的“天下第一团”。

乡间的道路是泥泞的,这个剧种的“天下第一团”剧团前进的道路也总是充满风雨。由于经济困难等原因,剧团一度面临被撤销的命运。淮北花鼓人不怕困难,坚持把这土生土长的艺术传承下去。他们的意见得到了文化部和安徽有关领导的支持,剧团才得以保留。从1992年开始担任了20年团长的华立仁从他收集保存的3000多张记录剧团发展历史的照片中精选出300多张,编成一本《风雨花鼓情》画册,翻看这一幅幅未加修饰的照片,人们自然会被剧团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被淮北花鼓人对民间艺术真诚热爱、精神所深深感动!

他们乘着手扶拖拉机下乡,睡在用麦草铺成的“暖窝窝”上。无论是卸车搭台,还是围着地锅吃饭,无论是老演员,还是稚气未退的年轻学

员,脸上都是乐呵呵的。雪天,把喇叭绑在树上,演员脱下大衣盖住音响。当地的领导和群众一起在露天广场看戏,和群众一起开怀大笑,他们懂得,保护和扶持群众喜爱的艺术是自己神圣的责任。

淮北花鼓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淮北花鼓人是巨大的鼓舞。政府扶持力度加大了。文化部和财政部给剧团配送了流动舞台车,演员们戴锣打鼓过年一样地把流动车迎进了村。大家感到鸟枪换炮了。但是,要让这个剧种能很好地传承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仍需要继续奋斗。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传统文化就受到外来文化、流行文化的强烈冲击,国家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实施。但要做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发展,传统戏剧,特别是地方小戏,面临很大的困难。如果一味迎合观众,丢掉传统的东

秘和私密的语言符号。人类对脚的依恋是一种近乎原始的情结。女性之脚则可能折射母系时代审美与臣服。因此,脚应该被赞美。

张继刚用近乎梦幻的手法,设计了脚的独舞和群舞,在这里,脚摆脱一贯的陪衬和附属地位,突然成为生命招摇的旗帜,在时空中奔跑和飘舞,脚的美轮美奂和人的面

术把握显然是钟情和自信的,但是“解放”毕竟不是单个人的人生命运,如果没有足够的张力和气场,这样一个主题很容易被架空。

以脚为基点,能够应对这样一个挑战吗?

在明清时代,中国士大夫出于自私的独占欲和狎邪的审美观念,促使一种缠脚的陋习蔚然成风。中国人

说唱剧《解放》2009年出品后,不断获得好评,2012年更是一举获得“五个工程”奖。选择《解放》这样一个题目,显然是得益于红色共和国在精神状态上的照射,但是《解放》在人性上的挖掘,使得作品超越了政治图解和庆典狂欢的局限,突入了幽昧迷离的人性深处,给观众以更深沉的震撼和感动。

《解放》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唱剧的形式创新,张继刚舞蹈的铺排和细腻,丰富的山西民歌元素等,但这部作品在人性方面的开掘不可忽视。我认为,正是人性的深层挖掘,为丰富的艺术元素的融入提供了可能;正是人性的挖掘,使得作品不仅好看而且发人深省;正是人性的挖掘,使得作品呈现的艺术形象中包含了丰富的思想价值,从而把“解放”的蕴含引向了更广阔深厚的空间。他们毋宁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把这部作品理解为以“脚”为爆破点的,奉献给人类心灵解放的颂歌和启示录。

《解放》选择了脚作为艺术形象的基点。一边是一个情节简单的裹脚、放脚的故事,一边是一个宏大的具有强烈能指的词语“解放”,这样的设计无疑带有艺术上的风险和自我挑战。联想到另一部获得观众认可的舞剧《一把酸枣》,也是写小人物的

小故事,导演张继刚对小中见大的艺

直指人性深处的《解放》

杨晓华

孔一样,成为生命美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撕毁了给人看。如此美丽的生命之花,在历史中却被打上卑下和耻辱的烙印。缠绕在脚上的至少有三种难以摆脱的裹带。脚的解放面临着三重厄运。

一是社会文化的压力。如果缠脚已经成为一种风俗,就具有了无可辩驳的合理性。小小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牢不可破的文化坚壳。面对这样的文化宿命,小小有可能获得姥姥的同情和保护,姥姥本人即是受害者,是牺牲品,她的脚的曲拱和

潮音阁

日前,赵本山宣布退出“春晚”的决定引起了舆论之轩然大波:没有了赵本山的春晚,以后将会怎样?而没有了赵本山的中国小品,大家以后又将看谁? 赵本山俨然成了某些人心目中的“春晚”的代言人。

与之相呼应的是,有人认为:有了姚明,中国男篮才打进了世界前八;离开葛优,“冯式经典”就难以延续;出了郭德纲,即将“没落”的中国相声才又重新火了起来……

在艺术发展中,明星究竟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笔者认为,引导作用最为关键。明星固然璀璨,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赵本山的小品为什么打动人心? 归根结底,离不开剧本好。试想,如果赵本山在舞台上表演的单纯是那些“顺口溜式颂词剧本”,那他势必不会取得今日的艺术成就。一个赵本山的成功,应当对中国小品艺术创作的方向与思路起到适当的引导作用,从而造就出千千万万个“赵本山”。可惜的是,赵本山之艺术价值并未被如此利用,而是被冠以“明星”的身份过度依赖。这种依赖,一持续就

是20多年,最终导致的结局是某些观众甚至认为中国小品除了赵本山之外几乎“无人可看”。

过度依赖明星,很容易造成看到明星巨大商业潜力的那些人,只专注于如何利用明星更好地赚钱,别的方面几乎不去考虑。而附庸风雅之人看到明星成功,则一味地崇拜、效仿、盲从,却根本不去思考其成功的真谛。这些对中国艺术的良性、可持续发展,都是颇为不利的。

过度依赖明星还会催生诸多怪现象。比如前些年超级女声的“非爷们不能拿冠军”等现象就是明星效应下的畸形产物。再比如NBA出了一个华裔球星林书豪。瞬间国内舆论大量报道,诸多球迷也摇身成为其“粉丝”。为何? 因为姚明离开了,易建联又不够“给力”,那些“明星依赖症患者”们急需一个新的精神慰藉!

艺术发展需要更多的新秀新作继续。若人们一味过度依赖明星而不思革新进取,恐怕只会诞生出五花八门的怪现象,艺术本身也会遭遇没落了。

许亚群



新编淮北花鼓戏《阳光下的召唤》

观点摘编

重视电视剧引领文化的力量

电视剧作为大众娱乐文化中较为强大的、不可或缺的、运作方式渐趋完善的一个部分,它对于受众价值观的内在影响、对文化与社会的导引力量,应该受到重视,使之发挥特有的社会担当的功能。

当下,在娱乐泛化的市场影响之下,电视剧过于逐利,过于追逐观众眼球和收视率,大量跟风复制的电视剧产生,电视剧的产量有井喷之势,而电视剧的品质却在某种程度上被弱化了,进而导致了电视剧引领文化风尚的社会功能的削弱。对于电视剧品质的探讨,应注重对其发展路径的引导。电视剧如果在品质上自我提升、走出瓶颈,就能得到受众的认可,拓展市场传播的能力,从而获得一种良性发展。

《〈电视剧精神品质的追问与思考〉》,《艺术广角》2013年第1期 喻宁/摘编

我国动画设计的两个局限

纵观中国动画的发展过程,其对传统审美的极大依赖性极为显著,早期的动画设计富有浓郁的装饰风格特色。而今面对新的市场形势,我国动画美术设计所遵循的传统形式上的追求也有所局限。一是早期动画片大多取材于传统故事及戏剧,片中大量沿用甚至照搬了传统的形象。二是风格平淡,创新乏力。

我国动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题材的较大限制——长期强调着“文以载道”的教化功能,忽视其审美、娱乐等功能。这种单一的认知使动画从题材开始以及相关一系列动画元素设计往往中规中矩,道具场景设定平庸老套从而整体上难以发挥出动画“高假定性”的优势。

《〈浅谈民族化对于中国现代动画设计的价值〉》,《戏剧丛刊》2012年第5期 喻宁/摘编

学、早恋,最后在学校老师、家长和同学的帮助教育下又重新回头。

笔者近期在淮北观看了这个戏,看到这部作品引起观众强烈共鸣和热烈反响。戏中反映的问题是当前一个很迫切的问题。青少年教育永远都需要重视,在当前,如何引导他们正确对待网络,抵制诱惑,要做艰苦复杂的工作。这部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家庭、学校和社会各个生活面,真实表现了老师、家长面对这一问题的情感波澜,扮演小博的演员比剧中人只大一二岁,虽显稚嫩,但演得很真切。作曲、配器杨春把传统的花鼓戏的曲牌、板式变通运用到这部作品中,使它具有较浓郁的淮北花鼓戏的韵味;剧组聘请了一些较年轻的舞美设计、舞蹈设计,在剧中融入了一些新的艺术元素,力求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审美阻隔。剧团的领导和演员们,决心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继续修改加工,使这部作品能成为受到观众欢迎的优秀保留剧目,并使淮北花鼓戏得到更好的传承发展。

《阳光下的召唤》是对成长中的青少年的召唤,这个剧名也让我联想到它还有一个寓意:淮北花鼓戏经过风风雨雨,会在充满阳光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

空。在他的感召下,小小完全有可能走出自己心理的魅影,摆脱旧的命运的纠缠,走向新生活。不仅如此,走西口、闯世界的亮亮,还可能突破纯粹自然的生命感受,带着小小走向人的觉醒和自由。事实上,《解放》正是通过亮亮,完成了戏剧逻辑的闭合。

应该说,姥姥、小小、亮亮三个人物体现了复杂矛盾,从其时性来说,他们的矛盾体现为具体的生活冲突,从历时性来说,他们代表了时代变迁中的人的整体性生存状况的矛盾。“解放了!解放了!”这种饱含力量的呐喊,发自个体生命的强烈而真实的需要,又穿越个体,放大为一个时代的隐喻和象征。

就这样,通过一个解放脚的故事,得到的启示是,“解放”在词汇学上尽管已经沉淀为政治革命的代名词,但是政治解放看来不仅仅是政治解放本身,还包括被扭曲和压抑的人的解放,或者说是从人性的深处激发出来的政治解放,唯其如此,政治解放才显得如此动人心魄,感人至深。政治解放的伟大恰恰在于,它尽管不能代替人性的解放,但为人性的解放创造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导演张继刚未必完全自觉地追求这样的设计,但是他的卓越的感性直觉使他达到了这样的深度,并将这种深度带向完全的开放。